

日本博物学史的近世起源¹

邢 鑫

摘要：白井光太郎被视为日本博物学史之父，他在 1891 年出版了《日本博物学年表》。该书提供的博物学史框架影响深远，至今依然流行。白井氏的博物学史并非凭空而生，而是在江户本草家的历史叙述的延长线上展开。浅田宗伯的《皇国名医传》中的本草学史为一节点。同时，对西方博物学的研究伴随着对新学统的确立。两者最终在白井氏著作中得以综合。

关键词：本草学 物产 稻生若水 浅田宗伯 白井光太郎

在日本科技史领域，博物学史是一个相对早熟的分支，而且其研究者常常具有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被视为日本博物学史之父的白井光太郎（1863-1932）同时也是日本植物病理学的开拓者，战后日本博物学史巨擘上野益三（1900-1989）则是一位生态学家，此外如《日本博物志年表》的作者磯野直秀（1936 - 2012）、著有《文明中的博物学》的西村三郎（1930 - 2001）都是生物学家。这一双重身份影响了他们的科学史写作，即偏向于相关史料的发现、解读，相对缺少编史学上的讨论和探索。这也使得白井光太郎确立的日本博物学史框架几乎未受到挑战，后来学者关于汉学本草学、兰学博物学以及文献实地、京都江户两大学派等诸多讲法皆承其余绪。那么白井氏的博物学史究竟源出何处？其对江户时代博物学及其历史的理解和江户时代本草家对自身学问及其历史的理解究竟是一种什么的关系呢？欲回答上述问题，首先不得不探讨江户时代学者们对本草学这一学问的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乃至研究主体的认识。基于以上的认识，形成了一种同时代的本草学史论述，虽然零散不成系统，却体现了当时本草家的自我认同。这些论述散见在时人的笔记和本草学作品的序跋中，而在幕末医家浅田宗伯的《皇国名医传》中有更成熟的表达。作为汉方医大家，浅田宗伯的历史论述对兰医置而不讲，遑论西方博物学。江户时代中期，伴随兰学之流行，西方博物学也开始在日本传播，并且对以《本草纲目》为模范的本草学构成了冲击，这一新的知识体系同样伴随着新的历史叙述，在《植学启原》、《泰西本草名疏》的序跋中均有出现。真正将两者的历史叙述结合，纳入新的历史框架中，则要等到 1891 年白井光太郎的《日本博物学年表》的出版。

¹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博物学文化与公众生态意识关系研究”（批准号 13&ZD067）资助。

一、正统本草学：从“正名”到“辨物产”

初刊于享和三年（1803）的《本草纲目启蒙》被誉为江户本草学的集大成之作，其作者小野兰山则被后人称为“日本的林奈”。该书卷首有幕府医官丹波元简（多纪元简，1755-1810）写于享和二年腊月的序言，颇能反映当时人对何谓本草的认知。节引如下（小野兰山，1974：3-5）。

夫本草者，医家之一种。而药物者，医师攸日用也。故为医者，虽研医经方之二种，然非读本草则不能识药物也。读本草者，必识玉石土草木虫鱼之形质而辨其物品，别寒炙温凉补泻刚柔之气性而审其主疗。苟能如是，而又精医经方焉，则诊候处疗，靡有乖违，医之能事毕矣。然而其书，唐宋间数加修纂，如唐本蜀本开宝嘉祐，所命执笔者多儒臣，儒者于方技固未能尽通，而业方技者又未必能执笔，是以博而寡要，杂而无实。唐氏之证类，虽采摭颇备，未敢抉择是非，竟不免乎泛滥。于是蕲阳李氏，搜罗群籍，贯串百氏，详考名实，引据征验，撰《本草纲目》五十二卷。本草之学，至于此集大成矣。第卷帙繁重，学者或病焉。

况我邦在于苍波浩荡之外，方域已殊，风土隔绝，物产不同。或有彼有而我无者，或有我无而妄充彼某物者，或有我有而不识为彼某物者。盖为斯学，毋乃难于彼土人邪。夫人之才力有限，已殚精于医经方诊候处疗之术，又欲僻药奇品所罕用物尽覆之，自非逸群之资，谁堪其繁，又将不暇及于此。故庸工粗医，日用要药，仅谙其主疗，尤且多不辨物品之真贋良苦。至其甚则认锡为锡亦或有焉。宜乎海舶所齎致，诸州所采送，一归于市肆，纵令巧诈百般，甘受其辱，不加怪也，其亦可重叹哉。

是以我邦前辈，有专以辨物产别为一家者。乃药性主疗付之于医家，置而不讲。如若水稻氏，最称阅览君子，著《庶物类纂》七百卷。恕菴松冈氏受其学，亦有所阐发者，用药须知若干卷。然稻氏过于浩博，松冈氏嫌于简约，并不便于医家焉。今兰山翁，出乎松冈氏之门，独以李氏纲目为宗，而汰稻氏之博，广松冈氏之约，参之于群籍，取之于亲验目睹，得之乎沉思默想，历涉数十年之久，殆极其精微博大矣。启蒙之书者，系其孙士德与门人冈村生，笔记所闻于翁而经其手订。而翁平生之心力，全存焉于斯。

.....

抑谓我邦本草之学，至于此集大成欤。洵医家必用之伟宝也。则老师国手必不得不籍检查于此书也，启蒙云乎哉。格物多识夫子尝称之，先贤曰一物不知君子耻之，则学士大夫必不得不架藏此书也，本草云乎哉。

该序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对本草学的两种不同理解；第二，对《本草纲目启蒙》一书的评价以及若水一脉学统的彰显。一方面，多纪元简指出：“夫本草者，医家之一种……读本草者，必识玉石土草木虫鱼之形质而辨其物品，别寒炙温凉补泻刚柔之气性而审其主疗。”这就是作为临床药学的本草学。而这一理解实际上是和中国官修本草传统一脉相承的。《本草纲目》虽然有很浓厚的博物学色彩，依然是以临床药学为归宿的。可以说，传统中国本草学始终以临床药学为

特征，从未斩断和医学的关联。另一方面，本草学在江户时期发生了新变化，“是以我邦前辈，有专以辨物产别为一家者。乃药性主疗付之于医家，置而不讲。”这就是作为博物学的本草学。和前者的最大不同在于彻底放弃了对药性的探讨，专注于“辨物产”，由此而脱离药学乃至医学的藩篱，一跃而入博物学领域。可以说，近世以来本草学的主流是作为博物学的本草学，故而一部本草学史即是博物学史。换言之，狭义的本草学以药学为界，广义的本草学则不限于此而近于博物学。本文所使用本草学皆取广义。

丹波氏将小野兰山置于稻生若水—松冈恕庵—小野兰山这一谱系中，不仅仅是对师承事实的描述，也是对以“辨物产”为中心的本草学研究的辩护和彰显。稻氏门下弟子不少，除松冈恕庵外尚有丹羽正伯、野吕元丈等，松冈氏门下则有浅井图南、户田旭山等，当多纪氏将稻生若水—松冈恕庵—小野兰山列为一脉学统，必然也意味着其余学脉的遮蔽。

那么，江户时期的本草家们究竟如何看待本草学，丹波元简的说法究竟是一家之言还是当时的普遍看法呢？笔者将以时间为序简单梳理江户学者们对本草学的性质、研究方法乃至研究主体的认识。

1.1 研究性质

本草学脱胎于医学，无论如何总是和药物相关；另一方面，由于本草学的讨论离不开中国典籍，名物学的色彩十分浓厚。因此，江户时代学者们对本草学的理解都与这定位有关。

元禄二年（1689），贝原益轩在为稻生若水《炮炙全书》的序中认为本草学乃“物理之学”：“先正曰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夫以物理之学亦大乎哉。其粗者正名称辨真假而多识鸟兽草木，是知其质也。其精者通晓其功能分别其良毒，洞察资用之方，其效验可以安危起卧而疗民瘼，乃人生日用之急务而化育之所不及者亦赖以赞助”（贝原益轩，1689：叙）。作为朱子学者，贝原益轩乃是从格物穷理出发理解本草学，并不局限于药物学或名物学，而是试图与人生日用相联系，近于所谓“格致诚正，修齐治平”。

在同书的凡例中，稻氏也提到了对本草学的理解，“本草一书，民命所系。凡学之者务在识真，不比他书，惟求其说而可也。时获古今名物之书，阅之率多疏妄，其传伪袭非久矣。夫药品称谓一违，则力用全乖，若有误服，遗害非浅。余窃叹焉。乃于治经余暇又有志于鸟兽草木之学，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性情”（稻生若水，1692：凡例）。他将本草视为“鸟兽草木之学”，其目的在“究其性情”。由于和人的性命相关，名物考证绝非仅仅是限于文字的，一旦错误，则贻害无穷。这一本草之学人命关天的思想屡被后来本草家所强调。

宝永七年（1710），稻生若水的好友室鸠巢为《庶物类纂》作序，探讨了本草和名物学的关系：“天地之间莫非物也。分物以命名，正名以辨物，然后名物之学有由焉。夫以学者视天下之物，星辰历象地理职官，礼乐典故宫室车服以及鸟兽草木之属，孰非名物之所聚乎。是故君子之学莫博于名物，而名物之多唯本草为然。夫本草以草名篇而土木金石羽毛鳞介皆在也……若本草之书专以审药材为重，其不预药材者不收，亦不过以医家之业方术之书而已。固不足以论古人名物之

学”(室鳩巢, 1710: 序)。他认为本草书过于局限, 无法涵括所谓名物之学。不像本草的方术性质, 而名物之学乃是君子之学, 也是儒者之学。

同样的, 稻生若水的弟子松冈玄达, 一方面承认本草神农以来的谱系, 另一方面则试图将之纳入儒学的框架内。正德三年(1713), 松冈玄达为若水点校的《本草纲目》版本写了跋文, 并表达了其对本草的理解: “本草盖肇于炎皇而陶苏陈寇诸贤相继, 渐次增广论撰品物益精, 终至明李东壁集古今之大成, 著作纲目一书……天下之谈名物论药性者皆取法于斯焉……夫格物正名圣学之所先也, 而学者往往高谈性理而于名物之事则视为微事末枝, 未尝注心于此……此书非独为医家一经, 实格物穷理之一端, 不可不读焉”(太田由佳, 2012: 345)。

江户中期后, 本草学相对独立, 不再是别的学问的依附。例如, 丹波元简在为《毛诗名物图说》和刻本作序时, 直接将本草与毛诗并列, “吾医修本草之学以辨明动植之名状, 是非欲夸博而斗奇也, 唯要知其功用以治人疾疹耳。儒者讲毛诗之学以疏证鸟兽草木之名物, 亦岂贪多识而夸博闻乎哉。要在去其象以正人之性情焉。夫治人之疾疹以跻寿域正人之性情以入圣域, 其事虽异, 而其理则同是。故诗三百要思无邪尔, 本草三百六十种要身无疾尔……予医也, 亦好序儒书, 况于解经之书乎。虽然此书疏解动植之物, 则涉于吾本草之学, 而修明本草者不可不参考此书也。是故于其请序, 论诗、本草之所以相表里者矣。”(丹波元简, 1808: 序)

比较系统地对此表达看法的有本草家曾占春(1758-1834)。在其解读《神农本草经》的作品《农经讲义》中有一篇文章名“本草名物物产各异也”, 写于文化丙寅(1807)。该书仅有写本, 故根据国立图书馆所藏(特 1-921)抄录全文。

艺术之行与世, 与时变迁, 合则以分类例明考证为旨, 锥工商亦务精微矣。惟升平无疆之化, 盖暨于此矣。特方技之中, 辨四性五位之功用, 论草木虫石之名号, 议奇异物产之真假, 自以称本草之学, 其人当浩博, 而其学则名物系焉物产系焉。然莫分而辨之者, 又或蓄草根木皮不识其良毒, 唱方言俚语不解其训诂, 或养玩奇殖者类乎艺户, 挑异产者庶乎列骨董亦以称本草之学, 以余观之, 拟博而寡用过泛而无实, 其学不异斫檀得驳马矣, 是今时之拙枝也。夫本草之为学, 稽之于古, 郑康成注周礼疾医, 谓治合之奇则存乎神农子仪之术(贾公彦疏是周末人也), 乃本草始题于神农子仪(梁七录载神农本草三卷, 周礼疾医贾公彦疏引荀勖中经簿云, 子仪本草一卷)掌禹锡云, 盖上古未著文字, 师学相传, 谓之本草。盖昔圣人尝庶草, 审五药之性, 郑康成云, 五药草木虫石谷也。定粹戾良毒, 识识相因, 教治合之齐, 救民之疾苦, 后世本草之书, 则权舆于斯, 自汉迄今甫千岁, 代代皆是谓本草也(至元朱丹溪乃谓五行分配之义, 逮明李东壁亦复继农皇之遗典而大成), 未必谓之名物矣, 未必谓之物产矣。药物之外, 诗书典籍所载万物及动植之名, 多识之, 博辩之, 是谓之名物之学也, 未必之谓本草矣, 未必之谓物产矣。辨土审时于田干埜, 种之收之生生不止, 或属乎山, 钓乎水, 以我产之馈, 取用他山, 相共交易, 则有益于我, 又有利于他, 之谓物产之道(周礼太宗伯百物之产, 郑康成注, 生其种曰产, 物产盖本于此, 史迁所谓货殖用之为先后者也),

未必之谓本草矣，未必之谓名物矣。是其事业微相似焉而各异也。概而言之，则本草方技之材也，名物诗书之用也，物产农事之本也。然辨本草则名物系焉，物产系焉，余以此分三等者如此。

曾占春认为本草、名物、物产虽然有近似之处，但是起源和功用不同。用今天的话说，本草属于医学，名物属于文学，物产属于农学。与此同时，他还批判了数种他眼中的不良风气，“蓄草根木皮不识其良毒，唱方言俚语不解其训诂，或养玩奇殖者类乎艺户，挑异产者庶乎列骨董”。

综上，江户学者们对本草学的理解介于药学和名物学之间，但其对名物的关注并不局限于典籍，而是通向了自然物，最终完成了从临床药学到博物学的转变。

1.2 研究方法

在《大和本草》中，贝原益轩提出了从事博物之学所要追求的境界，从侧面反映了他对本草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理解。“凡博物之学，非有广览强记之识，以通洽于古今，审问精思之劳以考验众物，则不能究其品物，通其性理，考其是非，正其诂误，分其真伪，辨其同异而极广博致精密”（贝原益轩，1911：19）。广览强记、通洽古今、审问精思这些标准反映了一种基于文献典籍的研究方式。

稻生若水认为本草学最困难在于“名之难明”：“夫物之难识者其名之难明也。名之难明者，五方之名既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别矣。至其名齐实异者，则愈加益淆乱，似之而非者，复易相紊。苟非详著形状细谭名谓，则其有不因名迷实者鲜矣”（稻生若水，1692：凡例）。其所提出的解决之道则是“详著形状细谭名谓”。室鸠巢则如此描述稻生若水的研究方法：“出产形状，验之经历见闻之实，名称、种类证之于错综同异之说。如是既久，然后悟夫本草之书大有未备，而其论形状定名称亦不免多有错误，要之不可据信。遂欲考订百家，折衷群言，部分类次，以成一家之言”（室鸠巢，1710：序）。在这里，研究方式上出现了从重文献到重实物的转变，但其目的依然是名物考订。

江村毅庵在为松冈恕庵的《用药须知》所作序中，也有对本草学研究方式的讨论。“称呼纷纷，易错易伪。乃至诸家所说形状，动辄疑似不明，自非卓识强记博阅载籍，加以采摘之劳，辨析之熟，则不能正名认真，充起沉痾救笃疾之用，宜乎难获其人焉。我方若水稻君诚所谓其人，而今亡矣。呜呼，犹幸亲受口授者落落相望，其业遂弘。松冈君儒雅精敏，长于说经，兼有辨物之眼，少年来以医药不明于天下为忧。与稻君游，讲明诸家本草有所不尽则泛参群策，必订正当否而止。暇则相携寻觅一草木一鸟兽，必的识其形状。每遇溪翁山叟，必询其乡名，叩其材用而后止。于是，晦者显，伪者真，错者正。厥有功于本草大矣哉”（太田由佳，2012：298）。此处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强调认识动植物的形态，田野考察也开始成为本草学的方法之一。此外，江村氏提出了分类在本草研究中的重要性。“凡草木禽兽之品，莫算其数。虽然，各有族类，犹人类庞杂而有姓氏之派别也……故其谈本草唯摘要语，不取枝论蔓说，务在细分族类。万木之山，千草之野，摄松冈君眉睫间，则烟纸霞帙一部草木活姓谱也。按谱而究，姑知其可知，不可遽知，置附

日后，如斯而已”（太田由佳，2012：299）。

1.3 研究主体

当本草学逐渐获得独立，其研究者自然也慢慢凸显出来。这不仅是研究者自身的身份认同，也是一种社会形象的形成。由于早期的本草家大多或儒或医，其儒者或医生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形象是主要的。

正德四年（1714），室鸠巢在为稻生若水所作《結髦居别集》序言中将其称为隐于本草者。“余友稻君以博物闻于天下而天下之言本草者归焉。然世之论稻君者多以为本草家之流，或又非之曰本草非稻君之志也。第其学该博而旁及之。尔有以二人之言问余者。余应之曰，稻君隐于本草者也”（室鸠巢，1714：序）。至少在 18 世纪初日本，本草家已经被视为学者之一种，但与此同时其地位又远远低于儒者。故而，从事本草者未必以本草家自命，而是以儒者自命。若水弟子松冈恕庵则称“先生者当代博物君子也。明察物性，旌别真贋迥出于东壁诸子之右”（太田由佳，2012：345）

有时候，对本草或名物之学的理解会反过来投射到对古人的理解。室鸠巢的《庶物类纂》序中将孔子描述为“精于物类者”，对于儒者而言，也是取得某种认同的方式。“余谓，昔者孔子教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而商羊、萍实、专车之骨与夫肃慎之楛、大野之兽皆代于圣人而识之。是天下之精于物类者莫若圣人也。孔子没，门弟子各传其诗书礼乐之说，而其名物之学则莫传焉”（室鸠巢，1710：序）。

从社会形象看，自江户中期以后，本草家或物产家在社会上开始有了较为广泛的认知。《平安人物志》是江户时代十分有名的京都人物志，自 1768 年首版现世后，每隔十年左右修订一次，一直到 1867 年第九版。在安永四年（1775）版中，共设立学者、书家、画家、篆刻者、卜筮者、相者六部门。天明二年（1782）版中，本草第一次出现。文化十年（1813）版中，该书扩充为三卷，本草部门消失，新设医家、物产等。文政五年（1822）中，新设种艺。小野兰山在《平安人物志》安永版中首次出现，当时划入学者中。在天明版中，则划入本草。在文化版中，物产部门则收入了兰山弟子山本亡羊、水野皓山。

通过对江户学者关于本草学的性质、研究方法、研究主体的认识的梳理，我们可以认为丹波元简的“我邦前辈有专以辨物产别为一家者”讲法乃是代表了时人的一种普遍看法。

二、本草学史与学统：以稻生若水为例

正如《本草纲目启蒙》丹波元简序所表明的，稻生若水在江户本草学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以稻生若水为切入点，可以考察本草学史是如何伴随着同时代人评论和后人的学统建构而萌芽的。

早在稻生若水在世时，就以博物名于天下，受到同时代学者的推重。贝原益轩在《大和本草》中对若水评价极高，“稻若水丈，平安城人也。旁通诸本草，博考于群书而精详于品物。本邦古来

言本草之学者，不能出于其右”（贝原益轩，1911：13）。若水好友室鸠巢也称“稻君彰信，京师人也。以博览强识名一世。尝以治经余暇，辄取古今名物之书而读之，莫不研究探索以求其精，而于本草最致意焉”（室鸠巢，1710：序）。若水弟子松冈玄达则认为若水更在李时珍之上。“先生者当代博物君子也。明察物性，旌别真贋迥出于东壁诸子之右。尝病纲目书遗漏尚多，未免有承袭之谬，以修经余暇寓意于昆虫草木学，以平章群品为己任，兀兀不倦，纂辑多年，累稿成堆，殆盈千卷，网罗古今，笼架品汇，勒成一家之言。”（太田由佳，2012：345）以上三人对若水的推重对后人有很大的影响。

在《赅鞭余录》的屈玄珪序中，若水更是被置于日本本土本草之学的谱系中，乃是继《日本书记》中的大己贵命而起。“烈山氏者邈矣。本草之业，汉魏以来，众贤踵起，辨白修广，世跻其美而终迄于明瀕湖李氏集其大成焉。实为万事龟鉴矣。几欲观天下之庶物品类者必皆取法于斯焉。抑我皇和大贵氏亦邈矣，尔来数百世虽曰无精本草之业者可也。昭代文明有若稻若水、松恕庵二先生者出，始继烈山大贵二皇之业本草之学复明于我东方焉。后世谈名物论药性者皆适从于二先生，其功岂不伟哉”（屈玄珪，1761：序）。

在十八世纪中叶，若水为本草学首倡者的观念被广泛接受，并不局限于若水一系的本草家。例如，平贺源内在1761年所写《东都药品会引札》中有言，“甚矣，本草学之不可不讲也……元禄中，稻生先生始唱此学于京师而贝原、松冈二先生继出。此学大行于海内，其所著书亦大益于后进”（平贺源内，1935：1501）。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若水是本草学首倡者。儒医南川维迁（1732-1781）在其笔记《闲散余录》中有“本草学者”一条，“讲求本草及物产采药诸事始于向井元升，至稻生若水尤盛。贝原笃信亦好本草，著大和本草。若水自言著述百余卷，唱和集内见向乞韩人序事。但未传世。今新校正本草虽托名若水，和名未见允当，实可疑。初住京师，受加贺聘。自加贺蒙召江户，受命撰庶物类纂一千卷”（南川维迁，1891：1）。南川氏认为，若水并非首倡者，而是一大高峰。

同一时期，京都书家永忠原（永田觀鷲，1738-1792）所编于明和六年（1769）出版的《熙朝儒林姓名录》收入了稻生若水，“稻若水。名宣义，字彰信，号若水。首倡物产学，所著有结耄居别集、炮炙全书等”（永忠原，1769：34b-35a）。将稻生若水界定为物产学的首倡者，也是当时人意识的一种投射。

在宽政七年（1795）对弟子写的一封信中，小野兰山将自身置于若水-恕庵的学统中。“名物之事久为儒家之事，向无专门之人。物产吟咏之事自稻先生起。其在贵国仕官，时代、年号与贵地一致，显而易见。贝原、稻、松冈三先生皆伊藤家之友人，或许彼此曾有交谈。本草之学乃稻先生传于先师，后物故，此事写于书信中并传于先师，并具有手书。尝闻贝原先生先于稻先生物故，故学问未曾传于先师”（小野兰山，2010：482）。

在文政十一年（1828）《本草图谱》序中，岩崎灌园也是以若水为日本本草学首倡者。“然则为医者之于药物，惟由本草。本草之学不可不急且重也。上古圣神为作之经而来，莫世不讲之，至明李时珍纲目殆乎集大成，然详乎说而略于图，且其为说或谬妄者不为少，或专气味而遗形状，

今求之风气绝殊之东方，小大厚薄，美恶能否，既已不同而未能的知为某物，而浅人拟而用之者有焉，庸者不察而施之者有焉，学之不讲其害人不细也。乃有若水稻先生者出而斯学颇明，及贝原、松冈、阿部、田村、大田、小野诸先生继兴，则其说益精”（岩崎常正，1916：2）。

三、“西洋本草”与新学统

早在十七世纪中叶，西方博物学书籍如多登斯(Rembert Dodoens)的《草木志》(New Herbal)、约翰斯通(Johnstone)的《动物图说》(Historiae Naturalis)已经传入日本，可惜当时无人能解。此后，野吕原丈和青木昆阳受将军德川吉宗之命学习荷兰语，并著有《阿兰陀禽兽虫鱼图和解》。直到1774年《解体新书》出版，兰学方可谓成熟。伴随着兰学的普及，学者们方才开始逐步了解不同于中国本草学传统的西方博物学，他们对西方博物学的理解同样建立在和本草比较的基础上。学者们对西方博物学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承认西洋本草，认为有补于本草之学；其二，推崇西洋本草，以林奈为尊。必须指出，兰学家或本草家对西方博物学的理解主要受到两本书影响即多登斯的《草木志》和霍图因(Maarten Houttuyn, 1720-1798)的《林奈博物志》(Natuurlijke Historie)。《草木志》一书属于西方的草药书，性质上和中国本草书籍十分类似。后者则是对林奈博物学体系的介绍，更接近于近代博物学。上述指出的两种态度和不同学者对西方博物学了解程度的差异也有一定关系。那么，江户后期学者究竟如何理解西方博物学以及其与“和汉本草”之区别？新的学统和历史叙述又是如何确立呢？以下作一探讨。

3.1 “神农本草”的相对化

1815年，在本草家栗本丹洲(1756-1834)为大槻玄泽的《兰畹摘芳》所写序言中有如下段落。

药物之产于西洋诸蕃者，农经桐录及晚近本草之书，唯论其功用，而枝叶花实真伪之辨，鲁莽含糊鲜得其详。盖藐乎八纮之外，不身到目击，其耳闻重译传说。是犹郇氏注水经，至于塞外众流江南诸派，要非无乖错，而说于八纮之外乎。仙台医员大槻子焕凤耽西洋学，侧行之文楼罗之言，莫不精谙。彼境所产之药物，若枝叶花实功用真假之辨，读其书而得其详，验之病者而核其真。更纂华蛮诸家之说，甄综以作一遍名曰兰畹摘芳……乃至农皇未尝之品，桐君未采之种，逐件辨晰，殆无余蕴，可谓备矣。(大槻玄泽，1817：1-3)

虽然承认有“农皇未尝之品，桐君未采之种”，栗本氏依然是在华夷观念下理解西方博物学，“彼境所产之药物，若枝叶花实功用真假之辨，读其书而得其详”。此时兰学家主要关注西方名物的考证，对于博物学知识体系本身尚未曾注意。此外在为多登斯《草木志》译本《远西草木谱》所写序(1827)中，栗本丹洲对比了李时珍和独铎涅乌斯(多登斯)：“……古昔农皇开本草之学，历代诸贤迭有所损益，唐慎微撰证类而粗详至李东壁著《本草纲目》而全备矣。后世修此学者，虽俊杰接踵不得不以纲目为本草家之龟鉴也。曾闻西洋有独铎涅乌斯者著《草木谱》，其书鸿篇大

策，主治效用悉备，后世彼境修此学者亦咸以此书为草木家之著型也。然其为书异形诡言，横行之亚别之字缠绵廓索，素不驯吾辈耳目。是以漫然看过，唯知东壁之可贵而未知涅乌斯之有可取焉……一日正恭携其译书来示曰，此吾侪曩所译西人涅乌斯草木谱。其撰述纪年一千五百五十四，云名义、生产、时候、形状、性效、主治，精密周到，搜罗赅博，概类于东壁纲目之例。……呜呼，东壁涅乌斯，地之相距如参商，事业之相侔如合符，且时世亦不斯而偶相及。抑气运有数而然欤，可不谓奇哉。（独度涅乌斯，1843：序）

无论是栗本丹州还是《远西草木谱》译者本草家吉田正恭都将《草木谱》视为西洋之《本草纲目》，吉田更指出“东壁涅乌斯，事业之相侔如合符”，由此可见当时不少本草家认为“西洋本草”与“和汉本草”在体例上并无差别，只不过处理的对象不同而已。无论是研究性质、研究目的并无明显的优劣之分。从后世的眼光看，至少在林奈之前，东西方博物学的差异虽有，确实未产生质的区别。无怪乎接触到《草木谱》而不了解林奈的本草家们会产生这样认识。

3.2 本草与植学

1822年，《菩多尼诃经》出版，宇田川榕庵在文中展示了一种不同于本草传统的学问。

“如是我闻，西方世界有孔刺需斯健斯涅律私、木里索肉斯、刺俞斯、多儿涅福尔笃、歇尔满、葛苏法儿拔乌非奴私、马儿匹及斯、花列斯、律兑弗、大学师蒲尔花歇、大学师林娜斯等诸大圣，累代出世，各于其国发大愿力，建大道场，设大法会，出大音声，出真实言，说无有上微妙甚深最胜真理，教化诸弟子”（远藤正治等，2014：29）。文中出现的人物皆为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博物学家如盖斯纳（孔刺需斯健斯涅律私）、雷（刺俞斯）、林奈（林娜斯）等。以佛经体阐释西方博物学知识，乃是一种自我经典化的策略，也是与主流的本草学拉开距离的一种方式。随着宇田川榕庵对西方博物学理解的深入，其离本草学的距离也越远。箕作阮甫在《植学启原》序中所言“亚细亚东边之诸国止有本草而无植学也。有斯学而有其书实以我东方榕庵氏为滥觞……盖本草者不过就名识物详气味能毒，犹如知角者牛鬣者马，不甚与究理相涉也。若夫所谓植学者，剖别花叶根核，辨析各器官能，犹动物之有解剖，真究理之学也”，应当也反映了宇田川氏的态度。（远藤正治等，2014：112）

在《植学启原》引中，宇田川榕庵阐释了其对于西方科学体系的理解，“西圣立三科之学曰辨物也，曰究理也，曰舍密也。以错综万物，贯之于一，于是隐者显，微者覆，可以赞造化之妙也。盖物之生于两间，形质或异性情不能同，如动之与植，植之与金石之区以别也。故学者必先修辨物之学，而类其形质征其异同。次之以穷理，而穷动何以飞走，植何以荣枯之理。又次之以舍密，而离合万物所以资生之元。由是观之，辨物者乃理学之入门也……辨物之学别之曰植学曰动学曰山物之学”（远藤正治等，2014：315）。毫无疑问，辨物即是博物学（Natural History），“辨物者乃理学之入门”体现了其对博物学在近代科学中的地位的一种理解：博物学不仅是专门之学，也是整个科学体系的基础。此外，在《学原》一节中有近似表述，“天高地厚矣，万物森罗于两间，别之为三有曰动物曰植物曰山物。动物有生产死亡有知觉，生生不爽形，动迁自适，其学曰素录义

亚,此译动学。植物无知觉,不能动迁自适,其学曰淳太尼加,此译植学……万物之学别为三门,一曰斐斯多里,记录形状,辨别种属,盖辨物之学也。二曰费西加,穷万物之所以死生以荣枯以蕃息之理,盖穷理之学也。三曰舍密加,知万物资以始生聚以成体之元素,盖离合之学也。辨物启原穷理之端,穷理为舍密之基。辨物者,学之门墙。舍密者,理之堂奥。”(远藤正治等,2014: 317)将博物学分为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无疑来自林奈,“斐斯多里,记录形状,辨别种属,盖辨物之学也”则直接指明了博物学的内容:记录形状、辨别种属。

宇田川榕庵不仅对西方博物学有深刻的理解,对于其历史也有相当把握。在《植学启原》引中,他简单描述西方植物学的发展,“汇类植物,昉乎加撒尔氏,继是尔后木里松、歇尔满之徒,蔚然而起各建一家言,揣悬之说亦往往参错乎其间矣。及苏亦斋之医林娜氏,创建二十四纲,分类植物甚精当,其所说逾越旷古,后进莫不推之为标准焉。近时百尔索翁、微尔尔德纳等别有发明,复建一百纲,其说亦行于世”(远藤正治等,2014: 315)宇田川氏认识到了林奈博物学的巨大影响,并且对之十分推崇。林奈取代了李时珍乃至神农,成为新学统的开端。

当时认识到林奈博物学之印象的并不限于兰学家们,一部分本草家也有认识。例如大河内存真在为其弟伊藤圭介《泰西本草名疏》序中有言,“本草之学,医家之先务,不可以不讲也……家弟好修其学,深有所见,于是译述西医春别尔孤所著本草书付梓以广其传,名曰泰西本草名疏。疏和产草木有罗甸名者,纤悉不误,万汇森列可指诸掌矣。兰家本草别有架筏,祖述林娜斯,此编原本亦从之,因又附识于其后。举网张目,逐款插注所可证者,发栝而缙贯焉。而后,一类一种条理井井,犹人有姓氏之派别,可谓草木之谱牒。其精诣秋毫无漏,固兰学之所长于天下也。夫草木区以别,夏尝称之,而区别之法,诸家纷纷,支论蔓说,使后学眩惑。今环瀛之内得此一大奇诀于万里之绝域,岂不愉快哉。其法超绝诸家迥开一路,和汉古来所未言及也。后之学者舍此编奚择哉……余也于兰说不同臭味,虽然,极知此编一出,使兰学家由是用药无谬。一草一木皆可为医工之利器,岂不有益于医事乎。要之,草木之理亦遂可穷,实格物之一端也。学子家皆当置一通于侧,岂兰书云乎哉。”(伊藤圭介,1829: 1-3)

在《泰西本草名疏》题言中,有如下一段。

近岁西洋之学行于我东方,自天文历象地理以至我医内外诸科往往具备。然其本草之说,以方域已殊,产物不同,故先辈所译率多强牵差伪。虽间有发明,要之斯学未全备,实我医之缺典也……

吾侪修西学者,当以博举本邦产物,质之西说,正名覆真,充治病之用为急。而实乏其人,未见有其书者,何也。其专事翻译者,置本草之说不讲,本草者流则唯务辨汉名之当否而无从事于西学者,二者无由参合,终致使斯学不明。适有志及二者,亦未见有知彼土本草之规则与和汉大异,判非一辙者也。呜呼,西医之修业,未必假资于本邦,然菟桴耳及春别尔孤广辑本邦产物,各有著书,业已刊行诸彼土,其用心之厚,可谓勤矣。岂可以此土学者而不若之乎(伊藤圭介,1829: 1-2)

伊藤圭介认为，前人学习西方博物学的问题有二：第一，“所译率多强牵差伪”，在名物考证上不够准确；第二，“未见有知彼土本草之规则与和汉大异，判非一辙者也”，未能理解西洋本草之规则。有趣的是，尽管认识到这一差异，他依然将西方博物学放在本草学框架内处理，而非如宇田川榕庵那样完全抛开。在另一段文字中，他首次描述了西方学者研究日本植物的历史，这些信息很可能来自西博尔德。“西洋人撰皇倭本草者，菟桴耳、春别尔孤二人而已。自余虽闻有绵至设而、挽耳尹垵而等著书，盖其所收采仅仅。然尔，菟桴耳者元禄三年（彼纪元一千六百九十年）来寓崎馆，元禄五年（彼纪元一千六百九十二年）舶归，所著本草书，锲之在正德二年（彼纪元一千七百十二）。春别尔孤者为林娜斯门人，安永四年（彼纪元一千七百七十五）亦来寓崎馆，其明年舶归。其间仅一年所，而采访弘博，著书颇富，本草书锲之在天明四年（彼纪元一千七百八十四年），其所鉴定新类二十二属，新种三百十六品，其功最盛矣。”（伊藤圭介，1829：2-3）对于林奈，伊藤的评价也是很高，“林娜斯立解剖花蕊之法，定为二十四纲，每纲系以目，目中分类，类中别种。西洋近世修斯学者皆一从此说，而四大洲中一切植物，百千万亿，品类夥多，虽如奇诡变幻不可究尽，要皆不能出斯二十四纲之范围矣。呜呼，彼土本草之规则与和汉之流迥别也。故非详知林娜斯之说，精究各纲各目各类各种之征证而定之，而漫以臆裁充用，则免乖谬之失者几希，学者不可不察焉。”（伊藤圭介，1829：2-3）

饭沼欲斋的《草木图说》是日本第一部以林奈分类法整理日本植物的作品，其所写《草木图说前篇引》中如此区分本草学与植学，“方今唱本草学者率以多识汉名为长技，与余所望植学者大不同矣。今夫得一草一木则熟察其形状，解之味之图之记之，要在较之其书，知其名辨其性，以供我用也。”（饭沼欲斋，1856：2）在这里，本草学与植学的价值已经高低立判。与此同时，植学所接续的学统无疑已经是西方的。“泰西讲植学亦久矣，三百年前已有图说可证者尔。后百家蔚然，品种日新，讨论月精，至挽近发明草木有雌雄两蕊交感生生无穷之理而众人议论大定。林娜氏由之以建纲目属种之条，弃假择真，遍正其名称。其徒福乌笃氏集成一大部书，然后其学大备，后进仰而宗之矣。江都宇田川氏创译其书，启植学之源于我东方，伊藤氏继而和之，遂至使后进得门径之要。二氏之功，不亦伟乎”（饭沼欲斋，1856：1）。

总言之，江户学者们对西方博物学了解越深，其推崇越盛，“西洋本草”逐渐脱离本草学而变为植学，林奈成为新学统的象征。伊藤圭介首次整理了西方学者研究日本植物的历史，而饭沼欲斋将自身工作置于泰西植学背景之下，反映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的萌芽。“神农本草”式的共同体神话逐渐被以林奈为象征的新神话所取代。

四、从《皇国名医传》到《日本博物学年表》

真正比较系统的日本本草学史总结在汉方医大家浅田宗伯所纂《皇国名医传》中出现（浅田宗伯，1852：中卷10）。

本草之学以辨气性为主，西土据其名求其产，尚且不能无差失。我邦隔海万里，因彼名

以求我物，欲其不谬，抑亦难矣。故我之为斯学，须先讲究名物，然后及于气性。古昔，地有药园之设职，有采药之使，又命深江辅仁撰《本草和名》以布于世。好生之德，可谓至矣。中世丧乱，百度颓弛，医学弗讲，斯典亦废矣。庆元革除，神祖留心医药，如吉田宗恂辨珊瑚、柏枝蒙嘉赏，称为异闻。当时诸医于药物气性各有撰者，然率不过因陈演腐为课蒙之资，要属草创。至肥前向井元升、筑前贝原笃信（字子诚号益轩，世仕福井侯，著大和本草）等，始对证彼我，亲验物产。既而稻生宜义者出著《庶物类纂》一千卷，其徒承而精之，高者足以驾西土诸家而上之矣。江户又有阿部照任，特以此学显。于是本草、名物遂为一科矣。后道本草者率祖稻生、阿部二氏。故序其师授源流并取事迹可考者而附焉。

浅田宗伯首次提出“后道本草者率祖稻生、阿部二氏”，这一说法被白井光太郎所继承，对后世影响极大。

4.1 黄遵宪与本草学史

通过黄遵宪，浅田宗伯的本草学史论述也传入了中国。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史实湮没无闻，在此略加钩沉。

脱稿于光绪五年己卯（1879）的《日本杂事诗》中有一首诗——一六八——以本草为主题（黄遵宪，2005：5）。“遍搜本草谱群芳，千卷书传海上方。采药如编十洲记，定知多少入药囊。”诗后附有注释：“本草之学，以华名证倭产，时有参差。至向井元升（著《和名本草》）、贝原笃信（著《大和本草》）。始亲验物产，以考物名。既而稻生宜义著《庶物汇纂》一千卷，又有阿部照任（少乘漕船赴江户，遇颶漂入福建，留十八年，得本草学而归），幕府命采药东海、北陆诸州，三至虾夷，得物甚富，石药尤多前人所未道者。余所见诸书，皆俾色体状，辨昧察色，以定其性质，各绘以图，系以说，其精审有过于华医。如汇集之，亦大观也。”黄遵宪在光绪十六年的自序中曾言：“余于丁丑之冬，奉使随槎。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起书，习其事。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串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黄遵宪，2005：6）由此可见，《日本杂事诗》起于《日本国志》的撰写，两者有着相近的信息参考源。而在《日本国志》的卷四十《工艺志》的“医”一节中也有一则和日本本草学相关的记载，“本草之学因中国之名以证日本之物，颇有参差，至向井元升（号灵兰，肥前人，著《和名本草》）、贝原笃信（号益轩，世仕福井侯，著《大和本草》）始亲验物产以考物名。既而稻生宜义（字彰信，仕金泽侯）著《庶物汇纂》一千卷，其徒承而精之。又有阿部照任特以此学显。（照任，号将翁，南部人。少时乘漕舶赴江户，遇颶漂入福建，留十八年得本草学而归，幕府命采药于东海、北陆诸州，三至虾夷，所得物品甚夥，石药尤多前人未道者。）后之道本草者，皆祖稻生、阿部二氏。”（黄遵宪，2005：1554）

黄遵宪关于江户时期日本本草学史的描述不可谓不具体，从“余所见诸书”一句看，他也接触到了一些日本本草学著作，认为“其精审有过于华医”。但是其本草学史论述则是直接源自浅田宗伯的《皇国名医传》中的本草家、稻生若水、向井元升、阿部将翁诸条。

向井元升（浅田宗伯，1852：上卷 28）。

向井元升（字以顺号灵兰又观水子），肥前神崎人。父兼义为郡名族，以疾谢事移居长崎，元升从迁。自幼勤学，名显于邑中而不欲儒。先自居以医为业，近邻诸藩厚聘招之皆辞。万治初，游京师，遂家焉。奉后水尾上皇诏治八条金刚寿法王笃疾，于是皇子后宫及诸公卿有疾皆求其诊。当时京医，推为巨擘……

灵兰著有《和名本草》、《广求经验秘方》等十余种。

稻生若水（浅田宗伯，1852：中卷 10b-11a）。

稻生宜义，字彰信，通称若水。父正治，宜义受父学，又师木下贞干，以儒医仕金泽侯。初长崎卢草硕讲究本草，作《药性集要》授同邑福山德润。德润往大阪唱其学，宜义从而受之。性妙鉴别，总括古今，著《庶物类纂》。尝谓人曰：“使吾得条理天下事亦如此草木矣”。书成手写正副二本，正本献之幕府，副本纳于藩府。其友新井珣称曰：“年未五十而有千卷之著，古今所罕觐也”。无几卒。门人有松冈玄达、丹羽贞机、野吕实夫。

若水著《庶物类纂》外，有《炮炙全书》、《本草图翼》、《食物本草》、《物产目录》、《采药独断》、《食物传信纂》、《孝女传》、《诗经小识》、《结耄居别集》等。

阿部将翁（浅田宗伯，1852：中卷 14a-15a）。

阿部照任通称友之进（号将翁），南部人。少时乘漕船赴江户，遇颶漂到清国，止于福建十八年。得本草学归居江户。享保中幕府求通知本草者，或荐照任。乃辟使采药于东海北陆诸州，三至虾夷，以劳赐俸及宅。更给地于城东，植养药种。照任前后所得物品甚夥，至石药尤多前人所未道者。

……

门人有田村登、松井某（通称半兵卫）。

将翁著有《诸国采药记》。

除了文本的相似外，有若干细节可以辅证黄遵宪确实参考了《皇国名医传》。《日本国志》中“向井元升著《和名本草》”，该书一般称为《庖厨备用倭名本草》，而在《皇国名医传》中正是以《和名本草》这一书名出现。另外，《皇国名医传》中贝原益轩“世仕福井侯”的描述有误，实为福冈侯。而《日本国志》中也是“福井侯”，证明其信息源确实是来自《皇国名医传》。

4.2 白井光太郎与日本博物学史

在幕末明治初期，随着西方知识的传播，本草学开始逐渐转变为近代博物学，并且在近代教育体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1877 年东京大学理学部生物学科成立，后又分为植物学和动物学，标志着近代博物学高等教育和研究体制的出现。白井光太郎正是继斋田功太郎后东京大学植物学科

第二位毕业者。当时对于博物学史感兴趣的学者不少，这些学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受过传统本草学训练的如伊藤圭介和山本章夫，另一类则是接受了近代科学教育的如松村任三、白井光太郎、三好学。

1879 年，伊藤圭介发表《本邦博物起源沿革说》，以人物列传方式对日本博物学史做了梳理。文章起首明其心迹，“本邦博物学起源沿革精穷之，溯古照今，以备将来针路之议论。首先追慕先哲言行履历，参鉴收集其著书，以为他日考证之一助，且欲其光华不与草木共朽。”（伊藤圭介，1879：10）山本章夫在《和汉本草学》一文中对德川时代本草学简略的描述：“德川氏建橐以来，有曲直濂道三之《玄禁本草》、向井元升之《庖厨本草》等。贝原益轩之《大和本草》、野必大之《本朝食鉴》，乃博学大德之人孜孜究此学，大有益于后人也。此大家首为稻生若水，继之以松冈玄达，小野兰山为巨擘也。兰山之《本草启蒙》可谓大成也。然欲斯学之日新，锁港以前与万国交通之今日，非革新之说则不能。”（山本章夫，1897：7）

对于博物学史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则属白井光太郎无疑。在《日本博物学年表》中，白井氏完整考察了日本博物学的历史，提出了日本博物学史的历史分期，第一次系统总结了江户时代博物学家们的师承系谱。他首先将博物学一分为二，即兰学派和汉学派，汉学派再一分为二，分别以稻生若水、阿部将翁为宗，即后来所谓京都派和江户派。

究竟何谓博物学，白井的想法并非一成不变。在《日本博物学年表》初版中，他并未给出博物学的定义，不过他的历史分期颇能反映其如何理解博物学。他将日本博物学史分为三期：上古至德川氏是“本草学时代”，德川氏至明治初是“博物学时代”，明治初后是“生物及地学时代”；后两者到了增订版中则分别变为应用博物学时代和纯正博物学时代。（白井光太郎，1891）。起初，博物学被视为本草学和生物学的中间阶段；后来，博物学的概念扩大，并且产生了纯正和应用之区别。在增订版中出现了对博物学的界定，“此处博物学乃网罗动植矿物相关智识之学术。旧时分本草学、物产学、名物学三科也”（白井光太郎，1908：5）。对于明治后博物学的基本特征，其描述如下：“此时代伴随欧洲学问的输入，博物学亦面目一改，化为动物、植物、地学三派。动物学、植物学中划分器官、解剖、生理、病理、分类、分布、发生学、细胞学、细菌学、进化论等科目，探究生物一切的学理。地学中设立金石、殭石、地文、地质、地理诸科，地球之起源、构造、性质及风土、物产、人情、风俗等专攻之学兴起。古已有之的实用博物学之外，理学博物学出现，虽主张其应用者，亦不能不以理学博物学为根本而讲究之。”（白井光太郎，1908：2-3）在这里，日本本土的本草学、物产学、名物学被纳入了应用或实用博物学的范畴，而近代欧洲博物学属于纯正或理学博物学。这样一种划分无疑也是当时普遍接受的进步主义历史图景的反映。

那么，白井氏为何以应用博物学概括江户时代的博物学呢，所指究竟是何？不同于德川时代之前“博物学常为医学之一部分。专以辨知药物，考明其气味能毒为务，故当时博物学与医学之盛衰一也”，博物学在德川时代获得相对独立。对于其基本特征，描述如下。

此时代博物学稍扩其范围，药物之外，动植庶物名称、效用、来历皆讲究之。专以物产

辨知为目的，其讲究范围扩张之，乃有推究深研一部类一种属之必要。如左各种专门家遂出。

- 一、本草家（向井元升、丹羽正伯、野吕原文、浅井图南、津岛如兰）
- 二、博物家（贝原益轩、稻生若水、松冈恕庵、小野兰山、木村巽斋）
- 三、物产家（阿部将翁、田村蓝水、平贺鸠溪、佐藤中陵）
- 四、西洋本草家（宇田川榛斋、宇田川榕庵、大槻磐水）
- 五、植物家（岩崎灌园、饭沼欲斋、伊藤圭介）
- 六、植物奇品家（水野逸斋、伊藤伊兵卫、水野元胜）
- 七、菌覃家（坂本浩然、市冈智宽、增岛兰畹）
- 八、鸟类家（堀田正顺、苏生堂主人、毛利梅园、佐藤中陵）
- 九、鱼类家（奥仓鱼仙、神田玄泉、畔田翠岳、栗本丹州）
- 十、昆虫家（栗本丹州、饭室乐园）
- 十一、玩介家（八太翁、武藏石寿、西村广休）
- 十二、弄石家（木内小繁、吉田正三、石丈野史）
- 十三、考古家（藤井贞干、穗井田忠友、栗原信充、松平定信）
- 十四、地理家（长久保赤水、古川古松轩、伊能忠敬）（白井光太郎，1891：2）

白井氏概括了江户时代博物学的基本趋势：第一，考察范围的扩充即从药物到动植物；第二，研究目的在于辨知物产；第三，部类研究兴起，专门家层出。这一观察迄今依然是站得住脚的。

此外，他认为，江户时代博物家对于明治博物学之进步也有开拓之功。“此等专门家大抵皆医师、儒者、士人、商贾等，本业余暇讲究之。故其著书，数种大著述除外，皆应用的。又好事家讲究之，记载事实。其所说有欠周密者虽也有，我邦应用博物学及分类博物学从药理学旧态脱却，有今日之进步，实赖此博物家热心讲究并从事之。”（白井光太郎，1891：2）遗憾的是，这一评论未能引发后来博物学史家们的讨论，对于日本近世博物学和近代博物学的关系依然有待探讨。

参考文献

- 白井光太郎(1889). 日本博物学畧史. 植物学雑誌, 3(32):369-374.
 ——(1891). 日本博物学年表. 東京:丸善書店.
 ——(1908). 日本博物学年表増訂版. 東京:丸善書店.
 貝原益軒(1911). 大和本草// 益軒全集卷六. 東京:益軒全集刊行部.
 ——(1689). 炮炙全書序. 炮炙全書. 稻生若水. 京都:唐本屋又兵衛.
 大槻玄沢(1795). 六物新志. 江戸:蔦屋重三郎.
 ——(1817). 兰畹摘芳. 大阪:河内屋太助.
 丹波元簡(1808). 毛詩名物圖說序. 毛詩名物圖說. 清徐鼎撰. 須原屋善五郎、堀野屋儀助刊 (養眞堂藏板).
 稻生若水(1692). 炮炙全書. 京都:唐本屋又兵衛.
 島田勇雄(1971). 近代の語彙 II. 語彙史. 阪倉篤義編. 東京:大修館書店.

東条琴台(1883). 先哲叢談統編. 千鍾房藏版.

<http://www2s.biglobe.ne.jp/~Taiju/tjframe5.htm>.

独度涅烏斯(1843). 遠西独度涅烏斯草木譜.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文庫 08F0006.

飯沼慾斎(1856). 草木図説. 前編. 平林莊版.

黄遵宪(2003). 黄遵宪集. 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黄遵宪全集. 陈铮编. 北京:中华书局.

南川維遷(1891). 閑散餘録. 博文館『少年必讀日本文庫』第 1 編.

http://www2s.biglobe.ne.jp/~Taiju/1782_kansan_yoroku_1.htm.

弄翰子(1768). 平安人物志. 京都:百足屋治郎兵衛 錢屋七郎兵衛.

——(1775). 平安人物志. 京都:林伊兵衛.

——(1782). 平安人物志. 京都:林伊兵衛.

——(1813). 平安人物志. 京都:林伊兵衛.

平賀源内(1935). 平賀源内全集. 平賀源内先生顕彰会編. 東京:中村時之助.

浅田宗伯(1852). 皇国名医伝. 勿誤藥室藏.

屈玄珪(1761). 赭鞭余録序. 赭鞭余録. 豊田養慶編. 京都:永田調兵衛.

山本章夫(1897). 和漢本草學ニ就テ. 校友会雑誌(3):6-8.

矢部一郎(1980). 植学啓原=宇田川榕菴. 東京:講談社.

室鳩巢(1710). 庶物類纂序. 庶物類纂. 稻生若水. 内閣文庫特 054-0001.

——(1714). 結髦居別集序. 結髦居別集. 稻生若水.

太田由佳(2012). 松岡恕庵本草学の研究. 京都:思文閣出版.

小野蘭山(1974). 本草綱目啓蒙—本文・研究・索引. 杉本つとむ編著. 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

小野蘭山没後二百年記念誌編集委員会(2010). 小野蘭山. 東京:八坂書房.

岩崎常正(1916). 本草図譜. 東京:本草図譜刊行会.

伊藤圭介(1829). 泰西本草名疏. C.P. Thunberg. 名古屋:花繞書屋.

——(1879/1899). 本邦博物起源沿革説. 東京学士会院雑誌第三第四册. 植物学雑誌, 13(143/148): 10-14, 202-207.

永忠原(1769). 熙朝儒林姓名録. 京都:林伊兵衛.

遠藤正治等(2014). 宇田川榕菴植物学資料の研究:杏雨書屋所蔵//

武田科学振興財団杏雨書屋編集. 大阪:武田科学振興財団.

曾占春(1807). 農經講義. 写本. 国立国会図書館特 1-921.

The Origin of Historiography of Japanese Natural History

Abstract: As the author of *The Chronological Table of Natural History in Japan* published in 1891, Shirai Mitsutaro has been seen as the father of historiography of Japanese natural history. The framework of the historiography provided in the book is still popular now. The history of Shirai evolved from historical narratives in the works of herbalists in late Edo period. Asada's *Great Doctors in Japan* is the key work. While the study of western natural history in late Tokugawa period was accompanied with new historical narratives. The heterogeneous narratives are synthesized in Shirai's work.

Keyword: Herbalism; Natural Production; Ino Jakusui; Shirai Mitsutaro; Asada Sohaku;

致谢: 感谢刘华杰教授、沈国威教授在论文撰写中提供的指导。